

“粉”“黑”之争： 网络迷群极化的“日常化”转向

冯济海

提要：基于对国内篮球迷群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本文提出，在球迷等各类主题网络迷群里正日渐弥散着一种“日常极化”现象，并特别反映于“粉丝”同其敌对者“黑子”在互联网上长期的群体争斗过程中。“日常化”特征不仅意味着极化的频繁显现，相较于当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聚焦的带有突发性质的网络群体极化，此类迷群极化现象在发生机制、表现形式和演化路径方面也与前者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从迷群割据政治的角度为日常极化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以期拓展群体极化经典理论的解释边界，丰富对青年亚文化领域冲突心理与行动的理解。

关键词：网络迷群 群体极化 日常化 割据政治

一、引言

作为当今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一种常见组织形式，附着在各类社交媒体上的网络迷群早已成为媒介研究的热点。虽然较早涉足该领域的研究者曾经将这些基于动漫、影视、综艺等共同“趣缘”而聚合的网络团体设想为能够全然自由、平等交流的虚拟“乌托邦”家园（蔡骐，2015），但是到了今天，任何一位置身其中的参与者恐怕都不会再怀疑迷群内外同样充斥着钳制与对抗。比如，2020年春，国内艺人肖某的部分粉丝因认定某同人文学网站上的作品影射自家偶像，经周密策划，突然对多个网络平台发起大规模投诉。不过，由于随之而来的封号、平台和作品下线等连锁反应也波及了众多无关此事的其他迷群，这次行动很快便在国内青年亚文化领域引发广泛抵触情绪，2月27日，肖某粉丝与其反对者的网络冲突达至顶峰，甚至引起了众多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热度溢出青年亚文化圈层的“肖某粉丝227事件”可谓将现今迷群冲突规模化和组织化展现到了极致，而更多的迷群争斗却未必会进入大众视野。实际

上,由于观点、利益、身份认同等分歧,无论是在追逐演艺明星的“饭圈”,还是在动漫、小说、体育等主题社区,旷日持久的迷群争斗几乎无处不在。以本文分析的网络球迷社群来说,一场球赛可能引发的球迷群体冲突在经验丰富的参与者眼里几乎是能够预判的。另外,虽然迷群冲突时的枪口一致和群情激化也经常被当成群体极化的表现,但是将群体极化视为非理性的现象或结果有时并不准确(蒋忠波,2019),迷群冲突和极化尤有其特殊性,不应简单被视为群体极化经典理论强调的“群氓”式的同声相应。例如“肖某粉丝 227 事件”里的高度策略性的攻击行为就不宜套用群体无意识的框架来解释。

日渐频发的迷群冲突现象背后可能掩藏着重新发现青年亚文化的独特进路。亚文化内部的效忠从属关系不仅有“同意谁”的意义,还包括“反对谁”(费斯克,2001:30)。目前来看,关于“迷”文化中的“同意”,研究者已经在身份认同或亚文化认同的理论范畴内形成了大量论说,相比之下,聚焦这种“反对”的深入研究则稀缺得很。在这层意义上,廓清迷群极化尚未被全面阐明的发生机制,不仅能拓展群体极化经典理论的内涵,亦有助于更深入地把握现实中愈演愈烈的青年亚文化冲突问题。并且,既往学者在探讨群体极化议题时选取的个案大都带有鲜明的突发色彩,而当下的迷群极化更突显出一种日常化的总体特点,“日常”不仅意味着以冲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极化现象发生频率攀升,更重要的是,极化的成因、效果和逻辑均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进而又构成了系统考察迷群极化的一些关键线索。

对照群体极化经典理论的解释边界,网络迷群世界里那些正趋于日常化的极化现象是否已内生出了某些新的运作机制?围绕这一核心研究问题,本文以具体网络迷群作为分析案例,重点就迷群极化的形塑、影响以及内在逻辑等问题展开考察。具体而言,借由对迷群极化中的冲突话语与极化蔓延方向的剖析,本文首先探讨迷群极化趋于日常的动因,进而在中观层面反思迷群极化对迷群成员交流实践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波及迷群外部的相关主体。最后,本文将迷群极化的“日常化”定义为一种独特情感政治的表征,并尝试通过对这种情感政治框架建构的分析进一步阐释迷群极化的深层运作机制。

二、日常极化:迷群冲突研究的一个操作化概念建构

在以“日常化”切入迷群极化现象的阐释之前,有必要先结合迷群研究的知

识谱系来对“日常”进行一种操作化概念的转换。回溯迷群研究的轨迹，基于对科幻小说、电视剧、电子游戏等主题迷群的长期追踪，詹金斯率先使用“媒体迷”(media fans)来标记这些流行文化的拥簇者，称他们积极且训练有素，通过对大众媒介内容的消费实践和文化偏好的表现来建构自己的文化(Jenkins, 1992: 2)。这一经典论断也为往后互联网时代的迷群研究定下了某种基调，网络迷群由此被涂上了极为接近杜威所构想的那种理想“共同体”的底色，即所有成员都完全自由，民主成为其中的核心运作机制(Dewey, 2010)。

不过，网络迷群真的能够促成一种和睦、自由的交流吗？近年来，一些深入迷群的研究者也不断对此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迷群或许只是提供了一种充满包容的假象，事实上，成员对于内容文本的不同解读经常会招致非议，进而使部分成员遭遇歧视或排斥(Bothe, 2014)。例如《指环王》这类影视剧，其视听文本中显现出鲜明的正邪对立，就常常会造成处于不同立场的粉丝的激烈冲突(Hadas, 2009)。而竞技体育强烈的对抗性则使球迷之间的网络冲突更加突显，尤其是高认同度的球迷极易因支持的球队失利而出现消极反应(Carrington, 2009)。核心成员在迷群里公开传递的消极情绪或负面影响甚至可能给迷群带来毁灭性的分裂(Peer, 2014)。可以说，网络迷群中的交往加固了网络传播时代早期用户间的“弱纽带”(weak tie)联结，却难以降低这种交往深入后的多重风险。

国内学者涉及迷群冲突问题的研究则大致沿两条理路延伸。一是立足于网络治理立场，将言语攻击、过度投入、观念偏激等视为青年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杂音(孙丽芳, 2018)，并基于这种理解提供相应的对策；二是从身份书写、自我赋权、政治参与等方面赋予迷群冲突更积极的意义，较典型的例子包括以身份互动和集体行动等理论视角对“帝吧出征”等“爆吧”事件的分析。总体来看，以上两类研究取向均侧重于探究青年亚文化冲突参与者的群体情感和观念，但随着网络迷文化的发展，互联网上日积月累的关于冲突具体过程和方式的交流文本同样是迷群研究不应轻视的分析材料，深入这些文本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迷群冲突逻辑中微妙的差异和变化。比如，“帝吧出征”和“肖某粉丝 227 事件”本质上都是迷群成员对其“敌视者”的攻击行动，然而由于名义和攻击方式的差异，前者其实获得了不少近似“悲情与戏谑”的认可(杨国斌, 2009)，而“肖某粉丝 227 事件”得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外界评价。

将群体极化作为分析框架引入对迷群冲突的观察，可抵达上述两条理路遗留的一些盲区。由于极化还与极端化(extremity)和激进化(radicalization)相关联(夏倩芳、原永涛, 2017)，极化的覆盖范围不止是直接的语言暴力冲突。实际

上,迷文化实践中的过度情感投入还可能导致某些隐性冲突,例如近年来网上频现的“脑残粉”等贬义称谓就是源自迷群成员对群体内部那些偏激、狂热分子者的反感。并且,国内学者对“网络群体极化”的理论探讨通常是以“彭宇案”“帝吧出征”等裹挟在群情愤激中的网民大规模情绪和观念表达为个案,此类事件参与者甚众,意见的极化明确指向一端,但迷群对抗中的参与者态度却未必附和多数意见,而是与自身的亚文化身份认同关系更为密切(Bolsmann, 2014),这也使此类极化往往表现为两极或多极极化,从研究操作来说,应将冲突各方一并纳入观察。

始终存在的对抗性元素使得迷群极化的日常化问题很难得到根本纾解。对于网络球迷群体来说,年复一年进行的职业竞赛驱动着不同球队的支持者们无止无休的口诛笔伐。由此,围绕球迷在体育精神理解上的差异以及遏制失范行为的措施展开分析,堪称该领域的常规研究范式(Gordon & Rudd, 2010)。一些更细致的观察还发现,球迷口径一致的呼喊有时并非为了改变外部意见,而是意欲达到报复的目的(Wann et al., 1999)。另外,冲突还成了参与者强化其亚文化身份认同的方式之一,不少乐迷就是以此在虚拟世界里表达对其支持的乐队的忠诚(Baker, 2009)。随着迷群极化的蔓延,步调一致的群体冲突行动里也可能包含了其他意图。例如,有女性球迷在参与网络冲突的过程中就将球迷社群作为呼吁性别平等的战场(Dimitrov, 2008)。

建构“日常极化”的旨趣不单在于强调其频率特征,更关键的是由此去阐明迷群极化在成因和影响方面的特殊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强烈的亚文化身份认同使得迷群成员在卷入冲突时主要关注如何为“私利”发声,而非通过劝说、谈判和妥协来适应他人立场(郑永年, 2014)。有研究认为提供跟群体初始观点相反的有力论据将起到去极化的作用(Vinokur & Burnstein, 1978),但这类经典结论在迷群极化里也未得到有效验证。日常极化会随网络焦点的变换暂时消退,却很少被理性或合意的出现终结,故而不像带有鲜明“网络群体性事件”色彩的传统群体极化那样可以从过程中清晰地分离出极化、制衡和理性化等阶段(董阳、陈晓旭, 2015)。更具悖论意味的是,迷群基于兴趣的聚合在理论上应能减少参与者接触令其不快的内容的机会,但实际情况却是加剧了迷群极化的激烈程度(Hahn et al., 2015)。

不可否认,在探寻迷群成员独特的社会与文化互动时,国内的迷群研究也未能完全跳脱西方“迷文化”研究者曾落入的窠臼,疏于围绕现代性自我、认同以及流行文化之间的相关性去进行理论建构(Sandvoss, 2005)。令人遗憾的是,有

众多涉及迷群极化现象的考察由于未能深入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深层肌理，仅在媒介素养或网络道德的层面得出了相对表浅的结论。但正如波尔顿所言，绝大多数球迷其实是有意识地将网络迷群作为模拟和替代现实冲突的平台来享受阈限状态下的快感，而这跟现实中是否有暴力行为倾向几无关联（Poulton, 2008）。既然迷群极化的深层逻辑可能与其冲突表象大为不同，那么，对球迷等网络迷群极化的解读也就必须更多地超越冲突文本层面的观察，深入到亚文化情感的丰富性中去，进而将迷群与外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情境相关联。

由此，我们将围绕迷群极化的阐释，进一步回应以下具体研究问题：网络迷群极化具有怎样的生成与演化机制？迷群极化为何呈现日常化趋势？这将如何影响迷群成员的亚文化实践？如何理解迷群日常极化的深层逻辑？

三、研究设计

针对上述研究问题，本文以网络民族志为操作方法，以国内篮球迷群为重点分析对象。网络田野工作包括对球迷社群的参与式观察和线上访谈。与迷群研究领域更为常见的紧扣文本信息的话语分析模式不同，民族志取向的考察相对更偏重于文本生产的情境与过程。具体而言，当球迷在互联网上发生群体冲突时，除了冲突文本的内容，冲突在何种语境出现以及为何出现同样值得重视。当然，这对观察的即时性和长期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采取这种方法，与笔者在球迷论坛参与观察时间较久、具备一些经验“优势”有关。实际上，近年来不少迷文化研究者都有身兼迷群成员的双重身份（aca-fans）（Cristofari & Matthieu, 2016），“迷”研究的开创者詹金斯便是其中的代表。在他看来，尽管以迷群成员的身份来书写迷文化有时可能会招致争议，但是却能够提供一种其他角度难以实现的观察（Jenkins, 1992:5）。

本文具体的调查以互联网上的 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球迷为目标群体，选取他们关注的主要平台包括虎扑社区、贴吧以及微博上的多个篮球自媒体。上述社群里有大量话题讨论围绕中国篮球特别是国内顶级篮球职业联赛 CBA 展开，汇聚了关注中国篮球国家队和各支地方队的众多球迷。

本文的网络田野工作从 2016 年 3 月延续至 2020 年 12 月。在赛季进行期间，尤其是到了一些关键性的比赛场次，球迷之间的口诛笔伐会变得尤为猛烈，另外，CBA 每年有近半年时间处于休赛期，此时球迷冲突虽有所缓和，但并未休

止。概括来说,整个调查过程主要是系统观察和梳理不同类型冲突的发生过程、细节、情境,以及冲突是如何在球迷的网络交流中被酝酿、鼓动或平息的。除了参与式观察,笔者也对47位卷入过冲突的球迷进行了线上访谈。调查的总体目标是辨明球迷在重要赛事期间的突发性冲突与日常冲突的不同特点。

需要说明的是,“球迷”还不算是粉丝文化研究视野里的典型迷群,但以其作为回应本文研究问题的分析对象却更有独特解释力。主流迷群研究向来更关注那些娱乐工业文化的簇拥者,譬如时下偶像经济和新兴媒介共同催生出的“饭圈”就尤其受迷群研究者的瞩目,而球迷群体身份认同的形成本质上则是来自对某一体育运动的热情。不过,深入网络球迷群体内部却也不难发现,一方面,球迷之间频繁的网络冲突呼应了暴力色彩鲜明的传统球迷文化,另一方面,显现在球迷网络冲突中的极化心理又折射出时下喧嚣的“饭圈”印记,从而其不能再简单被视为现实球迷冲突的网络翻版。换言之,网络媒介不单是给球迷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渠道,还向传统球迷文化中注入了娱乐工业催生的粉丝文化的元素,并且此类现象在球迷以外的众多其他主题迷群里都有类似呈现。由此,选取球迷这样的非典型迷群来阐释其极化特点,反倒更有助于发现网络青年亚文化领域一些更加普遍、深远的变化。

四、“粉”“黑”之争的冲突模式及其日常化

迷群冲突在当今青年亚文化的日常实践里可谓俯拾皆是,而这类频繁出现的冲突之所以很少被当成极化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通常缺少作为讨论背景的事件性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难以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时间线来说明冲突的演化,制约了更深入的考察。并且,渐成常态的极化还被大量谩骂、嘲讽和攻讦裹挟,有时难登公共言论的大雅之堂。不过,球迷之间那些空洞、琐碎甚至看似无理取闹的冲突话语仍然透露着迷群日常极化的运作机制。

(一) 酸话:一种典型迷群攻击话术

相较于那些突发性鲜明的传统网络群体极化,迷群的日常极化时常显现为群体成员与群体管控机制“博弈”下的失控。以虎扑社区为例,该论坛设有名为“中国篮球意见区”的版块,而其中的主要内容却被球迷的各类投诉所占据。据笔者统计,尽管论坛对恶意言论的严格惩处已是人所共知,但从2017年7月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球迷间的相互投诉却多达 1273 起，这不仅表明了球迷冲突十分频繁，也反映出网络社区的内部管控机制并未完全遏制冲突。

网络争斗经验的丰富也使球迷们逐步发展出一套在迷群内部熟悉运用的特有话术，这套语言来自共同的理解和经历（陈璐，2020）。一旦熟悉其语法规则，人们就会发现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时常藏匿于字面之下。比如，虎扑社区的版规详细注明了禁止侮辱、谩骂、地域攻击和酸话等，这其中有着特定意指的“酸话”正是迷群冲突话术的一种独特展现。当论坛收紧言论管控尺度时，一眼可辨的人身攻击很难逃过禁言或是注销 ID 的惩戒，但在网络社区管制与抗争从未休止的博弈中，酸话却成了宣泄消极情绪的灰色区域，它虽被禁止，却不易取证。酸话不仅带有酸溜溜的隐晦嘲讽之意，还被打上了球迷文化的烙印。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它以语言符号暴力的方式展现球迷的自我赋权和对表达机会的争取（杨晓艳、马玉芳，2013）。比如，2018 年北京队与辽宁队的一场比赛结束不久，有网友转发了一张现场照片，画面显示观众席的一位辽宁队球迷后背上被扔了鸡蛋。不出意外，这一幕迅速触发了两队球迷在论坛上的交火，虽然论坛版主已提醒不得就此事相互攻击，但仍有诸多球迷以酸话来打“擦边球”。

@ 疯狂的麦克斯 4：扔点鸡蛋怎么了，5 打 8 不说，人家赢了，还不许庆祝一下，知道泼水节不，北京的习俗是臭鸡蛋节，恭喜北京队理论上以 4:0 战胜辽宁队。

以上评论具体展现了酸话的特点。它以反讽为主调，却又不使用带有明显人身攻击、很可能受罚的粗口。活跃在迷群里的常客很容易甄别出酸话，陌生的局外人却未必能做到。毕竟仅从评论的字面来看，甚至难以判断这名网友到底支持哪支球队。尽管表述中流露出戏谑之意，但有没有可能是北京队球迷自觉理亏的自嘲，或是第三方球迷的揶揄？该评论文本中“5 打 8”的出现揭示了其本意。近年来每逢 CBA“京辽大战”，辽宁球迷在与北京球迷激烈的网络争论中频频以此隐晦表述暗讽北京队似乎更受裁判的偏袒。这种看法并无事实依据，然而熟悉两队“宿怨”的球迷却很容易由此识别出辽宁队球迷的酸话。

使用酸话如同戴着镣铐出击。这一话术的流行出于试图打击“敌人”并使自身逃脱网络社区惩戒的动机。跟迷群文化掌故的结合使酸话的攻击性更甚于空洞的谩骂，但同时也可能招致更激烈的回应。例如以上“借题发挥”式的嘲讽，就使在“扔鸡蛋”事件中自觉理亏的北京队球迷不甘忍气吞声，以酸话还击，

几回合后,双方的争执很快偏离事件本身。当更多原本未在意此条球场新闻的双方球迷因酸话卷入冲突时,莫斯科维奇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印证,随着单个的人成为集体的一员,集体的“我们”借着个体的“我”开口说话,个体的人格受极端情感性活动的支配而发生深刻变化,沉溺于暴行、纵情于狂欢(莫斯科维奇,2003:22)。

(二)推动极化蔓延的迷群冲突记忆

通过球迷对酸话的操演,还可进一步发掘此类攻击行为同迷群极化的联系。综观国内学者关于网络群体极化的探讨,通常是在“网络群体性事件”“集体行动”“网络舆论”等话语里展开的(董天策、王君玲,2011),这些概念对成员行动整齐划一的强调至少表明冲突并非极化产生的充分条件,关键在于能否从冲突指向上提取出观念的合意。但冲突又很容易导致极化。桑斯坦(2010:104)指出,当人们通过亲情、友情、共同点或团结一致而相互联系,极化将更有可能出现。网络球迷群体就符合此特征,他们的组织、交流以及同“敌对者”笔战的动力源于球迷围绕共同支持的球队来建构共同体,并在其中发展身份认同(杨晓艳、马玉芳,2013)。同时,这种在冲突中得到强化的身份认同又推动他们更频繁地与外界发生冲突。

一次次冲突经历都沉淀在迷群的集体记忆里,而这些不断丰富的集体记忆又决定了此后迷群极化的可能性与方向。2017年,CBA老牌强队辽宁队在总决赛中爆冷败给黑马四川队,辽宁队丢掉冠军后,其球迷一度继续在网上以四川队夺冠全靠“三外援”、四川队没有四川人等说辞来跟对方球迷论战。不过,尽管辽宁队球迷拒不认输,但突然崛起的四川队及其球迷至少重构了他们眼中的“敌方势力”版图。正如群体给个人提供在其中定位记忆的框架,个人又把记忆定位在群体提供的心理空间里(唐纳顿,2000:37)。时至今日,那次失利早已过去,四川队的战绩不久之后也跌回谷底,不再是辽宁队的竞争对手,但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四川队的新闻还是会引来辽宁队球迷“观光团”的评论和戏谑。

迷群冲突记忆的日积月累也在悄然改变着争斗的逻辑。如今球迷的冲突已不再是支持的球队意外输球而导致球迷自身迫切需要宣泄情绪的应激反应,而是显现出网络迷群社会动员模式之下潜藏着的更复杂的情感(朱丽丽,2016)。正如以上提到的辽宁队球迷的嘲讽,通常字面是针对四川队,但其攻击目标已转向其网络笔战的对手——四川队球迷。桑斯坦(2010:192)认为,从全社会层面看,对于那些由众多志趣相投的人们组成的组织,其中存在的极化反倒使社会的

“观点的蓄水池”丰富起来，促进理性的解决方案的形成。但若将观察落脚至网络迷群这样的中观、微观层面，极化“日常化”趋势的加剧却明显是在不断强化迷群里“对人不对事”的行动逻辑，使成员们惯于朝着根深蒂固的极化方向去解读信息，这种蓄意为之的背后包含着一种更深层次的集体无意识。

(三)“粉丝”与“黑子”的对抗走向常态

在迷群极化的日常化趋势下，参与者不断将“我们”与“他者”加以对立。像是“某球队(球员)的球迷”与“非某球队(球员)的球迷”这类较为中性的身份定位，在更多时候被化约为一种剑拔弩张的“敌我”关系，这也使当今众多兴趣主题的迷群里逐渐出现了被“粉丝”视为敌人的“黑子”。关于“粉丝”与“黑子”这对频繁冲突的迷文化实践主体，不同迷群通常还有更贴近其主题文化特性的称谓，比如，北京队球迷惯常将其称为“京迷”和“京黑”。其中，“京迷”是跟“我”一样热爱北京队的自己人，“京黑”则是那些对北京队不怀好意的“邪魔外道”，为了捍卫球队，要坚决与之斗争。

“粉丝”与“黑子”这对水火不容的身份标签的确立，预示着迷群内部可能产生更具模式化的粉丝行动指南。实际上，在当今众多演艺明星的粉丝群体里，都流通着特定的粉丝守则，告诫粉丝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不行，严格的纪律规训使无法适应的人渐渐淡出，留下来的活跃分子则是价值观更接近的人。网络球迷群体在这方面也有诸多类似之处。关于成员言论是非的界定自有一套评判标准，而当标准的形成深受诸如“枪口要一致对外”的迷群观念影响时，个体如想要表达自认有理但跟群体主流意见相左的论调，则很可能承受来自迷群的舆论压力，感到不受欢迎和遭遇排挤(Bothe, 2014)。

“粉”“黑”之争不仅是粉丝成员的对外斗争，由此发酵出的极化情绪同样会抑制迷群内部的多元意见表达。反映在“道歉”问题上的态度就是典型例证。如今，两队球迷随着比赛进行在论坛同步展开笔战已是司空见惯，但是当争论的火药味在赛后逐渐散去，也有球迷会为自己的冲动言论向对方致歉。笔者在虎扑社区将“道歉”作为标题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 164 条主题帖涉及 CBA 球迷间的道歉。比如，其中一个帖子是一名北京球迷向此前对辽宁队球迷的过激言论致歉，点赞最多的一条回复基本能够代表对方球迷的回应。

@ AirKAriel: 北京爷们很多还是有担当的，但是没办法，哪儿都有素质低的，都不例外，别一棒子打死就好了。

有意思的是,为冲突而坦诚地道歉通常都能获得对方这样的谅解,但却很容易招致“自己人”的指责。换言之,如果本队球迷从接受道歉的一方变为致歉者,则己方的群体态度可能会截然不同,而这与此前的冲突里究竟孰是孰非几乎无关。另外,当诸如“京迷”和“京黑”等迷群身份标签无形中成为一些球迷识别“我军”与“敌军”的依据时,这种“粉”“黑”之争烘托出的对抗关系也直指极化观念在迷文化领域的蔓延之势。当无数迷群消极言论同“以爱为名”牢固捆绑,这跟邓宁从欧洲球迷暴力行动逻辑中的发现如出一辙,即球场暴力行为被参与者从象征性的角度加以积极的转喻,它关乎男子气概、捍卫领土和快感(Dunning,2000),他们呼吁有同样情怀的成员一起参与,且认定自己握有冲突合法性的依据。

五、迷群日常极化的内、外部效应

透过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参与者在看待“我群”和“他者”问题上的持续对抗,“粉”“黑”之争揭示出迷群日常极化的演化机制。在此,本文再将观察视角从具体的球迷冲突转向迷群外部的媒介环境,在这一中观层面,极化的蔓延使迷群内部扩张和对外交往过程均发生了独特的异化。

(一) 迷群内部的成员分化以及交流异化

对于此处的网络球迷群体,迷群内部的异化始于成员身份认同的分化。虽然个体出于共同兴趣自发汇聚仍是网络迷群等青年亚文化族群出现的根本原因,但在这种基于“趣缘”的总体逻辑之下,一个尚未被充分观照的现象是,迷群成员的聚合机制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它的形成开始愈加彰显个人主义色彩,即人们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而是把社会理解为欲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结合到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格里芬,2011:5)。换言之,个体投身迷文化实践的初衷日益表现为希望通过这种参与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却非笼统地因为“我们”都是球迷而相聚。

以习惯自称“辽迷”的辽宁队球迷为例,加入迷群的多元化诉求使我们能够从中甄别出“球迷”和“粉丝”两种不同特点的参与者。前者即传统意义上的球迷,他们对心仪球队的支持源于喜欢观看球赛或是热爱篮球运动。相比之下,后者的参与模式更带有迷文化里的“追星”色彩。实际上,职业体育组织为了推广

赛事品牌影响力而与流行文化深入接触，这在近年来已相当普遍。通过对欧洲顶尖足球俱乐部高度商业化发展的追踪，基利安洛迪从文化身份的角度将球迷分为支持者(supporters)、追随者(followers)、粉丝(fans)和漫游者(flaneurs)四种类型，他们在“传统型/消费型”球迷的分析框架下表现出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倾向(Giulianotti, 2002)。此处区分粉丝与球迷的逻辑与此类似。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类型的“辽迷”也能够和谐共处，毕竟他们都是因为支持辽宁队才集结起来的。

在迷群的日常交流中，“球迷”和“粉丝”这两个身份标签并非泾渭分明。一般来说，一名“辽迷”身上不会只显露出“球迷”或“粉丝”特质中的一种，或者说，一位喜爱观看辽宁队比赛的球迷又怎能对辽宁队没有更多的偏爱呢？实际上，就像很多球迷在网上热衷于借助头像或ID名称透露自己是某支球队的拥趸(赵旭东、高诗怡, 2017)，辽宁队球员照片和球队Logo也是“辽迷”常用的网络头像，至于像是“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等鼓动性很强的口号，更是备受“辽迷”推崇。单凭以上标识元素的使用，也许仍旧很难判断一位“辽迷”的身份认同特征更倾向于“球迷”还是“粉丝”，但这至少支持了社交网络有助于丰富球迷文化、使更多非传统球迷参与进来的观点(Pearson, 2012)。

值得注意的是，“球迷”和“粉丝”发生碰撞的“辽迷”内讧也不算少见。比如，有位“辽迷”就在一次与“自己人”的冲突之后发帖宣告退出论坛。笔者通过论坛私信询问得知了该球迷发帖的原委：“前几年坛子里还有很多老球迷，大家讨论的都是球队发展和战术分析这些干货。现在‘辽迷’里进来太多‘赢球粉’，输个一两场球，就能一起嚷着要教练下课；还有好多人完全不懂球，就是来追星的。咱们客观点评下自家球员，他们也不接受，搞的全是饭圈那套。今天忍不住，怼了几个脑残粉，居然还被管理员禁言，要这样整，咱就不玩儿了”(线上访谈 20180106 - T4)。

可见，迷群极化的“受害者”有时也包括迷群内部成员。上述访谈材料就展现了“球迷型辽迷”对“追星型辽迷”的不满。尽管这两者还不算是“辽迷”里的对立阵营，“球迷”和“追星粉”的行动特点在参与者身上往往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但迷群里广布的“第三人效应”却往往使个体倾向于认定自己才是冲突和极化中的理性持方(Spinda, 2012)。另外，由于当前网络迷群的参与模式不断降低迷群的准入门槛，在使得成员身份认同更加多元的同时，也在迷群内部催生出身份观念上的“鄙视链”，例如“资深球迷”相对于“新球迷”的优越感。而在群体极化出现时，迷群内部这种潜伏的对抗性将更易被触发。

(二)被挑战的“意见领袖”与极化疏导通路的阻断

迷群极化的影响亦时常扩散至群体以外。由于群体极化的极端情况被认为可能危及社会稳定(桑斯坦,2003),国内学者对网络极化的研究大多也是基于网络治理的立场。但具体到迷群极化,诸如“帝吧出征”等事件还是受到了研究者相对积极的解读,例如“爆吧”等冲突中的“圈层化”组织结构和深层行动逻辑就备受关注(胡菡菡等,2017)。与此相似的是,球迷的网络群体极化同样潜藏着完整的行动逻辑,而且较之“帝吧出征”等相对偶发的群体冲突,日常极化对迷群外部还有着更为持久且指向不同的作用力。

总体来看,球迷网络极化的指向同球场语言暴力在逻辑上多有相似。职业体育赛场历来是球迷语言暴力的重灾区,言语攻击几乎充斥于每场CBA比赛中。现场球迷对准的靶子主要包括对方球迷、对方球员和裁判(李冲、史曜生,2015)。将目光移向虚拟世界则不难发现,球员的社交媒体正成为当今另一易受攻击的目标。对比赛结果的不满令球迷迁怒于球员,去球员微博发表恶言恶语已像是社交媒体时代CBA观赛模式的组成部分。当零星的网络语言暴力汇集为群体极化的征兆,伤害可能更甚于球场暴力。根据笔者对CBA球员微博的不完全统计,在近两个赛季中,至少有25名球员曾因遭遇球迷群体攻击而关闭微博评论或停更微博。

除了球员,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体育记者、解说员及相关业内人士同样身处易受球迷攻击的行列。由于微博公共议题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意见领袖的推动(曾繁旭、黄广生,2012),体育媒体人给出的观点也会在互联网上左右相关舆论的走势,这种可类比于裁判的赛场吹罚对比赛的影响不仅使后者具备了球迷“意见领袖”的特质,也成了他们近来时常遭遇挑战的原因。比如,在2020年8月北京队与广东队的季后赛进行期间,就有众多广东队球迷在论坛集中发帖“炮轰”一位知名体育记者,虽然评论回复中也有不少球迷并不认同“炮轰帖”中指责的内容,但这些帖子明显在本队球迷那里受到了一致力挺。一位当时频繁参与讨论的广东队球迷对笔者的私信询问答复如下:“A以前一直偏北京就罢了,最近发的那些微博,更是在各种阴阳怪气地‘黑’广东,为了流量,张口就来。你既然当记者不要节操,吃相那么难看,那就别怪遭人喷了”(线上访谈20200809-T37)。

作为群体协商的关键要素,公共意见领袖受到冲击,致使疏导迷群极化的通路部分阻断。相较于强调态度表达、参与门槛较低的时政类议题,专业类议题则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陈华珊,2013),球迷群体的交流也印证了这一点,论坛里

更有分量的发言者多是那些能够通过 ID 等级体现追随球队资历的球迷。而当资深球迷不再稀缺时(艾瑞咨询,2016),迷群将呈现某种“去意见领袖化”的样态,球迷开始时常批驳体育记者等专业人士的言论即是一种直接体现。

球迷的身份认同与球队紧密捆绑,其观念和行动也就更难以事实为凭据。在当今中国职业体育赛场上,主场观众在比赛中齐喊“黑哨”大多并非因为出现明显误判,事实上,对于任何一次存在解释空间的吹罚,裁判给出不利于主队的判定很可能换来嘘声。与此相似,媒体人一旦在对球队的报道或评论里传递出负面信息,即便报道是如实、客观的,照样会引起忠实球迷不满。桑斯坦(2008)指出,未充分利用信息而导致群体协商失败的情况在具有认同感的高度团结的群体中更加显著,这也进一步解释了体育记者等迷群之外的意见领袖的权威何以遭到部分消解。就本文重点关注的网络球迷而言,他们的观点形成主要来自迷群内部交流,并不依赖外界意见。专业人士的言论仍受重视,但作用已不全在于给出更高明的看法,而是其观点更广泛的传播力是否“对我有利”。而一旦外部意见领袖的观点与迷群主导意见相左,便难免遭遇激烈回应。

六、迷群割据政治：日常极化发生机制的一个阐释视角

以球迷的“粉”“黑”之争为个案,在完成对这种日常极化成因和影响的解读后,若要探寻迷群极化更深层次的运作逻辑,除了聚焦成员的交流实践外,还有必要将迷群之外的宏大社会图景一并纳入考察。由此,本文尝试建构“迷群割据政治”这一话语来加以进一步的阐释。

(一)作为特殊情感政治的迷群极化

总体而言,迄今为止不少针对青年群体网络冲突的研究都过于笼统地将视野框定在了媒介素养的范畴内。换言之,旷日持久的“粉”“黑”之争固然折射出迷文化野蛮生长的一面,但若仅将这类冲突泛泛地归咎于网民素质,则可能将问题简化,甚至引向误区。在对 CBA 现场球迷失范行为的分析中,有研究者以不如 CBA 球迷构成复杂、主要由大学生球迷组成的 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鲜少发生冲突为据,得出球迷素质偏低阻碍了球迷文化建设的结论(马连鹏、刘月,2016)。单看此结论当然没问题,但这却难以解释本文针对球迷网络冲突提出的疑问:当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城市中产”成为目前 CBA 球迷主力时(尼尔

森,2018),网上的球迷冲突为何却愈演愈烈?

陆续进入公众视野的一系列青年亚文化冲突事件也推动了从“情感政治”层面对其行动和观念的考察(杨国斌,2009)。在“网络民族主义”这一得到详尽剖析的情感框架之下(王喆,2016),对迷群成员的身份生产(王洪喆等,2016)、互动仪式(刘国强,2016)、表达机制(谷学强,2018)等具体议题都形成了一些探讨。不过,相比于“帝吧出征”这样突显戏谑、悲情、大张旗鼓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对外抗争,发生在网络迷群内部以及同类迷群之间的“粉”“黑”之争鲜见高歌猛进的情感表露,也并未呈现严密的组织和动员机制。尽管还是有学者将众多相对小规模的、日常化的暗处角力同样视为情感政治的一种,并就其特点给出解读(朱丽丽,2016),但总的来说,对于“粉”“黑”之争作为情感政治的深层逻辑,相应的学术考察仍显匮乏。

迷群极化同样可以纳入情感政治的分析框架。借助此理论视角,也将从“粉”“黑”之争当中引出一些媒介素养以外的思考。2018年3月,随着辽宁队与广东队之间焦点比赛的结束,两队球迷在多个社群发生了摩擦。在虎扑社区里,一位活跃的广东队球迷与众多辽宁队球迷展开了轮番论辩,争执也很快从球赛讨论转为人身攻击,进而转变成地域攻击。而当这位大二学生事后回顾卷入冲突的体会时,则展现了球迷身上“游牧式的主体性”(nomadic subjectivities),即他们能够在社会机构的网络间穿梭往来,根据当下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效忠从属关系(费斯克,2001):“我是浙江人,从小就非常喜欢易建联(广东球员),所以支持广东队。我们班有好几个人都逛虎扑,也有各自支持的球队,但是大家基本不交流这方面的。至少我在网上嘴是比较毒,也经常开‘地图炮’,如果喷到生活中的熟人,被知道了,还是略尴尬的。现实中我跟北京、辽宁、新疆的同学,都玩得挺好,也经常一起打球,对他们没任何偏见。在网上有网上的人设,跟现实肯定是一样的,不然有啥意思?”(线上访谈 20180401-T7)

透过上述访谈可见,“粉”“黑”之争本质上亦属于一种情感对抗。尽管遵循哈贝马斯建设公共领域理路的学者极力呼吁避免干预信息的自由流通,令各种对立观点都能不期而遇,从而使互联网成为具有协商式民主的公共论坛(桑斯坦,2003),但一些新近研究却显示,这种过于强调论辩机制和公众理性的主导性范式或许低估了哈氏认为不具理性的“情感”的作用(袁光锋,2014)。以网络球迷为例,有时一场比赛里一次有争议的得分就足以引发他们的群体对抗。而当推动争论的动机主要诉诸情感而非理性时,通过论辩使其中一方被劝服的情况可谓极少出现,由此,新近的网络流行语更像是贴切的注脚:“别指望讲理说服

人，气死对方才是赢！”在这层意义上，极化的频现今令迷群仍未跳脱巴伯在互联网雏形期的预言，即网络社区交流“脱体”（out-of-body）的性质同时成为美德和罪恶的温床，无法带来真正的民主（Barber, 1997）。

作为一种特殊情感政治，经年累月的极化塑造出了“割据”式的迷群图景。CBA 球市历来同球队战绩挂钩，网上的情形也支持这种关联。基数更大、活跃度更高的球迷通常都归属于竞争关系更直接的球队，日常化的冲突同样多发生在这些球迷之间。并且，“割据”不单是结果的呈现，更是不断变化的博弈状态。对于身份认同强烈的球迷，捍卫球队不是对“黑子”的挑衅给予还击，而是在每次球迷群体对抗中力争上风。此时，诉诸理性固然是一条通路，但理性之声却常常淹没于众声喧哗之中。从对微博的观察来看，当两队球迷围绕一则报道展开激辩时，想在数百条评论里获得较多支持登上热评，言之有理并非充分条件。有时反倒是一句带有同仇敌忾意味的简单口号（比如“山西，闹他！”）会更容易获得本方球迷的积极点赞，以确保其评论占据热评，力压对方球迷的声音。

（二）从“网络民族主义”走向“地方主义”的迷群意识形态分化

从迷群割据政治的角度审视迷群的日常极化，其中还不断浮现网络民族主义之下细分出的“地方主义”印记。随着中国互联网整体意识形态分化表现为民族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的分裂，并快速带动其他具体议题极化（Wu, 2014），网络民族主义固然仍是迷群研究的重要解释框架，但有时也显得精细度不足。对于国内球迷，网络民族主义倾向尤其突显在偏狭的国族表述里。每逢中国男篮出征国际赛场，菲律宾、日本、韩国等亚洲对手便经常在球迷网络讨论中遭遇各种外号。然而一旦回到 CBA，国家队球迷便分解为各地方队球迷，针对外国球队的外号便改头换面到了国内地方球队头上。广东队、辽宁队这几支劲旅及其球迷就经常在一些对手球迷口中被称为“猴子”“酸菜”等。冲突的激化还使球迷之间的攻击频繁延伸至包含地域文化偏见的其他层面，比如广东球迷嘲笑辽宁经济落后，也反被嘲讽精明小气（冯济海, 2016）。

值得注意的是，迷文化视野中的“地方主义”并非网络民族主义的简单线性细分，在特定情境下它还可能与后者发生碰撞。比如，当被球迷寄予厚望的中国男篮在 2019 年男篮世界杯惨败而归时，主流媒体对男篮失利的报道主要聚焦于中国男篮球队整体，国内球迷在网上大量的意见表达、情绪宣泄、分析评价却是更直接地对准球员个体。而情绪色彩浓烈的观点指向往往更是与球迷自身的地方认同高度关联，以下来自某省球迷论坛关于中国男篮队内本省籍球员的讨论，

便折射出国族情感与地方认同相冲突时牵扯出的纠结心绪。

主贴：以后咱们别去国家队。反正也是背锅，干脆就别去了。

跟帖1：太赞同了，国家队就是个大火坑！费力不讨好！啥好都捞不着！

跟帖2：不去那不更完了，去了打不过，但是真使劲了，水平不行，技不如人。要是国家队召唤你了，你不去，那就是态度问题，以后更没好果子吃了。

“割据”也不只是各守一方领地，还包括群体势力之间的暗中角力、博弈与制衡。以对网络球迷的观察来看，其对支持球队的偏爱有时正是通过攻击竞争对手的方式来强化的。并且，为避免过早成为失利方，明处的攻击也在逐渐为“幸灾乐祸”这一网络迷群的流行情绪表露所取代(Tyler et al., 2019)，以至于竞争对手球员受伤、受罚、表现糟糕等常常都是迷群里的热门谈资。不过，这些背后议论即便仅限于在小圈子内进行，也很难不被外泄。幸灾乐祸的言论到处传布，最终又使迷群之间的极化情绪进一步加剧。

此外，地方主义所塑造出的迷群割据不仅体现于空间维度上的分化，更可被视为青年亚文化交往关系走向区隔的一个隐喻。尽管本文主要以网络上的篮球迷为分析对象，但这种关系疏离和重组的趋势其实早已显现于众多其他主题迷群中。以青少年受众基数更为庞大的演艺明星迷群为例，近年来，TFBOYS、NINE PERCENT、SNH48 等青春偶像团体在成团出道的短时间内便俘获了千万级的粉丝，不过，这些“粉丝”的面目也越来越不再是铁板一块，即便是同一个演艺团体的不同成员，都很可能各自坐拥并无多少交叠或共情的粉丝群体，同时，就连团体成员在演出时的站位或是电视特写镜头的多寡，都可能引起粉丝们关于“黑幕”的揣度，进而轻易触发规模性的对抗。

(三) 亚文化资本不均对迷群割据的推动

网络迷群为何会出现身份认同上的种种分化？这一追问其实也正反映出既往多数研究均是落脚在迷群被捏合为“共同体”的背景之下，却鲜少涉及同步发生着的迷群隔阂、破裂与重组。实际上，若将迷群视为一个也在不断吸纳各种象征资本进行综合博弈的场域，那么，参与者的“亚文化资本”理应受到更多关注(Jensen, 2006)。以网络球迷来说，那些仅在闲暇时参与迷群讨论者与“狂热分

子”通常有着截然不同的亚文化参与方式，球迷投入程度的不同与其亚文化资本的差距可谓互为因果。在此，成员所持亚文化资本的多寡主要体现为对亚文化相关掌故的熟稔程度、实践经验以及独家信息渠道等方面的差距。

成员亚文化资本的不均决定了基于“趣缘”的聚合并不足以维系迷群融洽。即便是在主题相对温和的连载小说迷群里，粉丝之间同样充满竞争和歧视，进而导致交流时经常火药味十足。受亚文化资本左右的观念冲突甚至还可能将迷群推向解体。举例来说，在以购买专辑这种传统听赏方式来抵御网络音乐下载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就曾导致美国摇滚乐队“R. E. M.”的粉丝社群走向分裂（Bennett, 2012）。在对国内球迷群体的线上观察中，笔者也多次见到类似裂解，例如一些看球资历深厚的“老球迷”以不屑同“菜鸟”争论为由选择退出，另行组群。迷群分解或重组可以看作群体极化的某种结果，但在此之前，旷日持久的摩擦更是迷群冲突的常态。近年来，这类极化关系尤为生动地反映在“脑残粉”“私生饭”“亲妈粉”等贬义称谓普遍流行于“粉丝”这一宽泛身份之下，其使用语境明显含有将自己与某些迷群成员相区别的意指。

亚文化资本的不均还使理论上平等参与的网络迷群逐渐趋向科层化。冲突手段的系统“升级”便是迷群内部结构从均质分化出层级的写照。国内迷群冲突数年前尚停留在琐碎、粗暴的谩骂层面，而新近的迷群极化已充分展现成员攻击行动可能达到的组织程度。在“肖某粉丝 227 事件”里，部分粉丝分头搜罗“罪证”向网络监管部门举报内容平台，这一攻击方式将迷群冲突的精细部署推向了极致。对此，“粉头”们在其中的策划和配合无疑起到了关键的导向作用。如今，从一名普通粉丝“晋级”为迷群里的“大粉”，除了强烈的参与意愿，往往还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或组织能力，抑或在视频制作、图片处理等有助于营造迷群氛围的技艺上拥有长材。随着以上亚文化资本被兑换为迷群里的话语权，这些成员便间接获得了相应的迷群科层权力。

意识到“冲突”成为亚文化资本积累与调用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理解迷群极化日常化的趋势难以扭转。而从中引申出的问题还包括迷群冲突的本质是否总是对应其形式？或者说，迷群冲突的爆发仅仅是源自参与者对其支持的亚文化的忠诚吗？埃哈特对土耳其女球迷的个案研究显示，有些人加入迷群的主要目的事实上是机敏地将此作为呼吁性别平等的途径（Erhart, 2013）。与之类似，对互联网上国内球迷的身份认同进一步拆解，也不难发现很多人的亚文化身份认同基础都不单是对篮球运动或特定球队的喜爱，而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成为一支球队的支持者有时更是为了以此表达对家乡的情感，或是同某些主流

观念抗争,甚至就是为得到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这些情形在其他主题迷群中也屡见不鲜,且往往在迷群网络冲突中得到最为清晰的展现。

七、结 论

通过对网络球迷群体“日常极化”发生机制、表现形式和演化路径的考察,本文形成了一种超越个案的总体反思——未来的迷群研究亟需更具整体性的观察视角。借由对中国网民“情感政治”的分析,袁光锋(2014)论及了互联网的“敞开性”如何使“情感”变得更具传染性,而如今的青年亚文化研究除了仍须聚焦于互联网对情感潜移默化的改变,还应充分观照到参与者们是如何有意识地利用互联网去塑造新的情感,这意味着对迷群极化的探察有时也须跳出“乌合之众”等面向群体极化问题的传统分析框架,否则便很难解释为何青年亚文化参与者的脸谱特征和信息来路都在日趋丰富,但这些推动理性的要素的增加并没有改变迷群极化日益频繁的结果。

“粉”“黑”之争的焦灼凸显出网络青年亚文化实践中两个参与主体的尖锐对立,但粉丝与黑子的身份边界却未必如此泾渭分明。迷群极化现象看似源于“黑子”这个异化的群体在迷群世界里的出现与扩张,在粉丝眼里,他们被视为迷群的挑衅者和入侵者。同时,粉丝文化撬动着巨大的流量经济,这一点也早已为资本力量所洞察,职业黑粉、水军在商业利益驱策下的出现,更使黑子的身份属性与行动逻辑日趋复杂。不过,总体来看,当前粉丝与黑子日常化的僵持主要还是发生在那些存在竞争性质的同类迷群文化参与者之间,比如本文考察的球迷群体中,他们在话语层面展现出最为广泛且直接的对抗,并在沉淀的冲突记忆里确认迷群的“敌友”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冲突中,双方关于“抗争”与“入侵”的理解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换言之,粉丝眼里行为或言语可气可恨的“黑子”其实也时常折射出自身的倒影。

以网络球迷作为分析对象,可以更直观地呈现日常极化正朝向非典型粉丝社群蔓延这一趋势。随着偶像经济的发展,国内的传统追星粉丝群体率先结成更具组织化的圈层“饭圈”,与此同时,频繁出现在当下公共讨论中的“饭圈文化”又因经常裹挟着谩骂互撕、网络暴力、刷量控评等诸多沾染极化色彩的乱象而备受诟病。球迷等娱乐工业文化之外的网络圈群也开始沾染饭圈特质,一定程度上与迷群成员身份认同的多元化有关。过去的网络篮球迷群体多由篮球爱

好者组成，而如今越来越多抱着追星诉求的粉丝逐渐加入其中。从结果来看，成员来路的丰富并未促进更具包容性的迷群讨论，意见分歧反倒加剧了社群内部对抗，进而可能导致迷群分化、强化或重组(Spears et al., 2011)。最终，不断新陈代新的迷群不仅在观点上变得更加极端，并且，外部意见领袖和理性信息对消解极化的作用也都大打折扣。

本文从情感政治的角度来进一步把握迷群极化的发生机制。虽然资本力量全面渗入粉丝文化领域致使当下的控评、屠版、拉踩等极化现象背后时常夹带着更为复杂的商业动机，但最普遍意义上的迷群极化行动仍然主要受参与者自身情感的驱动。并且，沿着情感对抗的行为逻辑发掘网络迷群极化的深层肌理，亦可避免将其缘由过于简单化地归为经济利益驱使或是媒介素养缺失。通过对网络球迷群体这个案的分析可以发现，球迷冲突话语表现出从民族主义到地方主义的转向，表明中国篮球球迷这一身份有时已不足以精准标记其身份认同，而这种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再分化的趋势同样广泛存在于其他主题的迷群中。另外，网络迷群冲突的加剧意味着网络青年亚文化社区也在日渐成为一个话语竞争的场域。在群体对抗中占据上风对迷群的行动力和组织性有要求，无形中也驱动着迷群内部逐渐衍生出某种权力体系，而参与者持有的亚文化资本往往决定了其在体系中的位置。当迷群在兴趣共同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科层结构，自上而下的意见流向很容易削弱迷群里的多元讨论，极化趋势便更难以避免。

本文对迷群日常极化的探究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群体极化理论的解释边界。经过集体讨论，群体比个体倾向于做出更冒险的决策，这是群体极化经典理论的核心论断(Stoner, 1961)，而网络话语冲突中的群体激进则表明迷群极化研究与群体极化经典理论仍有丰富的对话空间。不过，迷群日常极化也显示出与传统极化现象的差异。第一，传统极化理论将极化的产生归于一个“劝服性辩论”过程，但迷群极化中的辩论并非意在达成共识，而是要通过这种话语对抗来压制对手；第二，经典理论通常将传统群体极化的产生视为群体无意识的表现，而迷群日常极化里则带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灵活的战术调用，甚至冲突本身就是一种总体战术，同时，本文对网络球迷群体的观察也进一步印证了一个经典结论：当讨论的问题涉及敌对群体对本群体的看法时，群体判断会比普通情况下更加激进(Doise, 1969)；第三，无论是面向小群体还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极化现象，传统的群体极化研究主要在社会心理的框架下展开剖析，但深度理解迷群极化的线索则有必要跳出心理层面，着眼于迷群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矛盾，当迷群极化

呈现为一种话语或其他资源的争夺,意味着网络迷群其实也是理解转型期社会中各种其他文化矛盾的一个独特观察场域。

应当说明的是,本文基于网络球迷得出的分析有一定的适用边界。不同主题迷群之间巨大的亚文化差异决定了本文针对迷群极化的阐释只是给出了当前网络青年亚文化冲突的部分底层逻辑。受观察样本的规模和类型所限,在迷群的冲突模式、迷群之间的博弈策略、迷群成员的情感结构等问题上,本文还未充分深入。

深度打捞网络迷群极化过程中那些正在不断糅合与分化的具体情感,也将给当前备受关注的国内“饭圈”治理问题带来一些参考。自2020年以来,愈演愈烈的“饭圈”乱象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众多媒体批评的笔墨都集中于畸形的“饭圈”经济如何导致“饭圈”文化的扭曲,这也呼应了近年来在青年亚文化研究领域十分活跃的媒介政治经济学取向。聚焦于商业资本势力在国内饭圈的全面渗入,的确更能从本质上揭示时下网络青年亚文化实践中的诸多消极现象,但这种主要在宏观层面展开的批判理路却也常常抽离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许多复杂情感,或是滤去了其自身极强的主体能动性。就此而言,在迷群情感政治的视野下展开微观研究,可为理解“饭圈”治理这一现实问题提供一条补充性的路径。

最后,这样一项考察的意义也并不止于问题的诠释,同样关乎一些未尽问题的引出。比如,迷群成员的传统文化资本是如何转化为迷群实践的亚文化资本的?亚文化资本的差异又将如何影响参与者在迷群冲突行动中的角色?对于同一迷群内的成员,其对迷群情感的程度和指向可能存在天壤之别,那么,这些情感诉求各异的参与者是如何被整合进接连不断的冲突运动的?他们又是怎样共同决定迷群极化演化路径的?针对上述问题的系统考察将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一度被视为理想“共同体”的网络迷群,探寻其内部究竟还存在何种聚力和压力,而这些分析势必触及迷群文化深层肌理才能完成,也意味着未来的青年亚文化领域呼唤更多深入迷群且能够与之达成某种共情的深描研究。

参考文献:

- 艾瑞咨询,2016,《2016年中国互联网体育用户洞察报告》,6月7日(<http://report.iresearch.cn/report/201606/2597.shtml>)。
- 蔡骐,2015,《网络虚拟社区中趣缘文化传播的社会影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
- 陈华珊,2013,《业主论坛意见领袖——识别方法及其特点》,《青年研究》第6期。
- 陈璐,2020,《专访亨利·詹金斯:粉丝的权利与边界在哪?》,《三联生活周刊》第12期。

董天策、王君玲,2011,《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进路、议题与视角》,《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8期。

董阳、陈晓旭,2015,《从极化走向理性：网络空间中公共舆论的演变路径——百度百科PX词条保卫战”的启示》,《公共管理学报》第2期。

费斯克,约翰,2001,《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冯济海,2016,《被忽视的冲突：反思网络迷群中身份认同及其建构》,《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格里芬,大卫,2011,《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谷学强,2018,《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网络表情包的情感动员——以“帝吧出征FB”为例》,《新闻与传播评论》第5期。

胡菡菡、张艳慧、沈丽晖,2017,《“爆吧军团”的“圈层化”组织结构与深层行动逻辑》,《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蒋忠波,2019,《群体极化之考辨》,《新闻与传播研究》第3期。

李冲、史曙生,2015,《CBA赛场暴力冲突频发成因及管控对策研究》,《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5期。

刘国强,2016,《作为互动仪式的网络空间集体行动》,《国际新闻界》第11期。

马连鹏、刘月,2016,《由CBA川辽大战的球迷失范行为引发的思考》,《辽宁体育科技》第4期。

莫斯科维奇,塞奇,2003,《群氓的时代》,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尼尔森,2018,《2017互联网体育消费者行为报告》,9月1日(<https://wx.jcloud.com/market/packet/11045>)。

桑斯坦,凯斯,2003,《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竟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尹宏毅、郭彬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孙丽芳,2018,《青年迷群的群际冲突与社会风险》,《中国青年研究》第7期。

唐纳顿,保罗,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洪喆、李思闻、吴靖,2016,《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国际新闻界》第11期。

王喆,2016,《今晚我们都是帝吧人：作为情感化游戏的网络民族主义》,《国际新闻界》第11期。

夏倩芳、原永涛,2017,《从群体极化到公众极化：极化研究的进路与转向》,《新闻与传播研究》第6期。

杨国斌,2009,《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第9期。

杨晓艳、马玉芳,2013,《集体记忆与认同：球迷口号“换某某”的群体极化分析》,《体育与科学》第5期。

袁光锋,2014,《互联网空间中的情感与诠释社群——理解互联网中的情感政治》,《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8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赵旭东、高诗怡,2017,《网络时代的共同性构建——以跨国语境中的球迷文化为例》,《民族学刊》第5期。

郑永年,2014,《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曾繁旭、黄广生,2012,《网络意见领袖社区的构成、联动及其政策影响：以微博为例》,《开放时代》第4期。

朱丽丽,2016,《网络迷群的社会动员与情感政治》,《南京社会科学》第8期。

Baker, Andrea J. 2009, “Mick or Keith: Blended Identity of Online Rock Fans.” *Ident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1).

Barber, Benjamin R. 1997, "The New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Endless Frontier or the End of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4(2).

Bennett, Lucy 2012, "Music Fandom Online: REM Fans in Pursuit of The Ultimate First Listen." *New Media & Society* 14(5).

Bolsmann, Chris 2014, "Sport and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Revisiting The Race Game."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41(2).

Bothe, Gemma 2014, "'If Fandom Jumped Off a Bridge, It Would Be onto a Ship': An Examination of Conflict That Occurs though Shipping in Fandom." Paper presented at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Swinburne University, July 9 – 11.

Carrington, Ben 2009, *Marxism, Cultural Studies and Sport (Routledge Critical Studies in Sport)*. New York: Routledge.

Cristofari, Cécile & Matthieu J. Guittot 2016, "Aca-Fans and Fan Communities: An Operative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17(3).

Dewey, John 2010, "The Need for a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934)." *Schools: Studies in Education* 7(2).

Dimitrov, Roumen 2008, "Gender Violence, Fan Activism and Public Relations in Sport: The Case of 'Footy Fans Against Sexual Assault'."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4(2).

Doise, Willem 1969,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Polarization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2).

Dunning, Eric 2000, "Towards a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Football Hooliganism as a World Phenomenon."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 Research* 8(2).

Erhart, Itir 2013, "Ladies of Besiktas: A Dismantling of Male Hegemony at İnönü Stadium."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48(1).

Giulianotti, Richard 2002, "Supporters, Followers, Fans, and Flaneurs: A Taxonomy of Spectator Identities in Football."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26(1).

Gordon, Brian S. & Andy Rudd 2010, "An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 of Sportsmanship Attitudes Among College Student Basketball Fans." *Journal of Sport Behavior* 33(4).

Hadas, Leora 2009, "The Web Planet: How the Changing Internet Divided 'Doctor Who' Fan Fiction Writers." *Transformative Works & Cultures* 3.

Hahn, Kyu S. , Seungjin Ryu & Sungjin Park 2015, "Fragmentation in the Twitter Following of News Outlet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outh Korean Users' Ideological and Generational Cleavag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2(1).

Jenkins, Henry 1992, *Textual Poachers*. New York: Routledge.

Jensen, Sune Q. 2006, "Rethinking Subcultural Capital." *Young* 14(3).

Pearson, Geoff 2012, *An Ethnography of English Football Fans: Cans, Cops and Carnival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eer, Gregory E. 2014, *Who We Are: How Sub-Cultural Capital Intensifies Communication Conflict Between Whovians, Nuvians, and Fandom-At-Large*. San Diego: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 Poulton, Emma 2008, “Toward a Cultural Sociology of the Consumption of ‘Fantasy Football Hooliganism’.”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5(3).
- Sandvoss, Cornell 2005, *Fans: The Mirror of Consumption*. Malden: Polity Press.
- Spears, Russell, Martin Lea & Stephen Lee 2011, “De-individuation and Group Polariza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2).
- Spinda, John S. W. 2012, “Perceptual Biases and Behavioral Effects among NFL Fans: An Investigation of First-Person, Second-Person, and Third-Person Eff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Communication* 5(3).
- Stoner, James 1961, *A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ecisions Involving Ris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Tyler, David B., Joe Cobbs, Bridget S. Nichols & Vassilis Dalakas 2019, “Schadenfreude, Rivalry Antecedents, and the Role of Perceived Sincerity in Sponsorship of Sport Rivalr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24.
- Vinokur, Amiram D. & Eugene Burnstein 1978, “Depolarization of attitudes in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36(8).
- Wann, Daniel L., Brian Keenan & Leslie Page 2009, “Testing the Team Identification-Social Psychological Health Model: Examining Non-Marquee Sports, Seasonal Differences, and Multiple Teams.” *Journal of Sport Behavior* 32(1).
- Wu, Angela X. 2014,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Over a China-as-Superpower Mindset: An Exploratory Charting of Belief Systems among Chinese Internet Users, 2008 – 2011.”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8.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杨可